

茶座

总第十辑 2007.4

主编 王兆成 执行主编 王学典

历史学家茶座

孟祥才：我所知道的戚本禹

李 杨：潮流中的一叶扁舟——陶希圣与农民运动的一段因缘

刘 超：联大与“文革”后的华语世界——“西南联大与晚近中国”系列之三

马 军：中国抗战史学界存在的几个问题

郑晓锋：洗冤——寂寥宋提刑

黄力民：麦克阿瑟是怎样被解职的

徐思彦：思出其位：《历史研究》与苏州金德门案

王振忠：漂广东(上)

山东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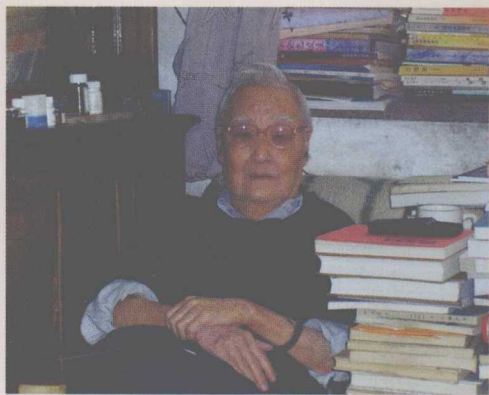


冬景题画 李 邕

对雪寒窝酌酒，敲冰暖阁烹茶。
醉里呼童展画，笑题松竹梅花。

一代史学名宿赵俪生先生逝世

一代史学名宿、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俪生先生于2007年11月27日10时20分在兰州逝世，12月1日兰州大学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赵俪生先生，1917年生，山东安丘人。1934年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就读，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担任过“清华文学会”主席，从事新文学创作，翻译出版苏联小说《孤独》。抗日战争爆发后，毅然投笔从戎，赴山西抗日前线参加抗战，其间到过延安。1939



2005年1月赵俪生于兰州大学家中

年至1947年在陕西扶轮中学、雍兴高级工业学校等校，以任教的名义从事地下工作。1947年应聘为河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948年任华北大学第四部研究员。以后历任济南市政府秘书、中国科学院编译处副处长，1950年调任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同年转任山东大学教授。1957年调入兰州大学，1991年离休。

赵俪生先生学识渊博，擅长理论思维，主张思辨与考据结合，几十年来始终挺立在学术前沿，奋力耕耘，风范独具，魅力四射。先生学兼文史哲而尤精于史，在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文化史诸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对西北之学、地方史、边疆史、蒲松龄研究等也广有涉猎。先生是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开拓者，从1953年起即与夫人高昭一联袂从事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次年就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研究农民战争史的专著；先生在中国土地制度史的研究方面也堪称先行者，而且史论结合，自成体系；晚年专攻先秦文化，探讨中国文化的源头，在许多专题研究上另辟蹊径，影响深远。先生的成果辑存在《中国农民战争论文集》、《中国土地制度史》、《寄陇居论文集》、《篱槿堂自叙》等十余部著作中。主要论著编为《赵俪生文集》六卷。

赵俪生先生执教半个多世纪，桃李满天下，在许多领域都有深具影响的学术传人，先生虽然走了，但他的学术身影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淡出学术界。

赵俪生先生一生交游广泛，与20世纪众多学术名家熟识，他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即受到胡适赏识，与闻一多、茅盾、叶圣陶、范文澜、陈垣、艾思奇、华岗等文史哲诸领域大家颇有交情，也与郭沫若、成仿吾、杨联陞等先生发生过正面冲突。他评点20世纪学术名家，见解犀利，别具一格。为表达对先生的纪念，山东人民出版社拟在近期推出《不一样的学人：赵俪生评点20世纪学界名流》一书，敬请关注。

主 编:王兆成

执行主编:王学典

学术助理:扬 眉

编委会:

于 沛	王 和	王子今	王春瑜	王曾瑜	邓小南
牛大勇	仲伟民	刘志琴	刘 平	朱政惠	苏双碧
李伯重	李振宏	陈春声	张国刚	杨念群	杨 豫
辛德勇	张耀铭	宋德金	赵世瑜	徐思彦	徐秀丽
徐庆全	黄朴民	阎步克	彭 卫	葛兆光	葛剑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学家茶座.第10辑/王兆成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209-04355-7

I.历... II.王... III.史学—丛刊 IV.K1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7670 号

出 版 人 金明善

项目负责 王海涛

责任编辑 王海涛 张智慧

封面设计 李海峰 版式制作 刘冉冉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sd-book.com.cn>

社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编辑部电话 (0531) 82098901

发行部电话 (0531) 82098021

邮发代号 24-50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16 开本(172×232 毫米) 10 印张 160 千字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4.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重建历史与伦理的联系 王学典

不能否认,深处转型进程中的当下中国已经进入一个道德真空阶段:传统规范已基本失去约束力,新型的人伦秩序尚未完全形成。这一真空阶段的极端表现,就是社会上越来越拿行凶杀人不当一回事。在导致这种人伦缺失的众多因素中,历史学难辞其咎。

众所周知,贯穿于两千多年中国历史叙事的是一种基于纲常名教的伦理观念,近几十年来,史学界则用“社会进步”的标准取代了伦理尺度,并由此展开了一系列著名的历史翻案:为殷纣王翻案,为秦始皇翻案,为武则天翻案,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是为曹操翻案——为曹操翻案所造成的影响,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上,都难以估量。它使人感到,杀几个人乃至屠城怕什么,只要有利于“进步”!于是滥杀无辜的曹操就从一个乱世奸雄变成了一个令人敬仰的英雄;凶残暴虐、坑降卒四十万、焚书灭儒怕什么,只要能加快“归于一”的进程,于是秦始皇的“暴君”称号就变得比“仁君”称号还要荣耀……这样,纲常名教固然因此荡然无存,人伦尺度也因此丧失了任何立足之地。仁慈、道义、和平、善良等人类的基本价值统统失去了意义,剩下的只有成王与败寇这个赤裸裸的事功标准!尤有甚者,史家通常还用“历史的必然规律”来为暴力和流血辩护。在这个“必然规律”面前,不要说个体生命,就是部分群体的生命似乎也变得一钱不值,而这个“必然规律”和“历史意志”的现实承担者,即便是毫无人性,似乎也必须肯定。“历史必然性”的体现者就这样可以不受伦理准则的约束,甚至认为只有把温、良、恭、俭、让等人性灭绝,某些人才可以更好地执行“历史的律令”。人们公然为已有定评的“恶人”翻案,做几千年来人们不敢做得为“恶”公开辩护的事,而且还理直气壮,深层原因可能就在这里。历史学就这样在一段时间内放弃了教化和致善的责任。

今天看来,“封建”的纲常名教当然应该、而且也必须批判,但其中所蕴涵的人类的基本伦理准则不应该被颠覆与抛弃;尤其是,我们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赞美战争,播种仇恨,粉饰屠戮,开脱暴行,无论它曾经在多大程度上推动过历史的“前进”。“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仍然应是今天乃至明日历史学的基本价值。

主 编:王兆成

执行主编:王学典

学术助理:杨 蔚

编委会:

于 沛 王 和 王子今 王

目 录

卷首语

003 王学典 重建历史与伦理的联系

本辑特稿

007 乔幼梅 王学典 又为学界哭英灵——痛悼赵俪生先生

学坛述往

013 邵 建 胡适留学归来时

021 李 杨 潮流中的一叶扁舟——陶希圣与农民运动的一段因缘

028 孟祥才 我所知道的戚本禹

040 散 木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几位学者(之四)——“毕竟是书生”的周一良先生

051 刘 超 联大与“文革”后的华语世界——“西南联大与晚近中国”系列之三

史论沙龙

062 金恒源 雍正继位真相研究的误区

069 马 军 中国抗战史学界存在的几个问题

073 黄朴民 可怜的预流:韩国的秦汉史研究

人物春秋

077 聂作平 962年的三个男人——赵匡胤、孟昶、李煜

- 086 郑晓锋 洗冤——寂寥宋提刑
- 095 陈梧桐 自从出了朱皇帝
- 099 王学泰 慈禧、光绪身边的史官(三)——从《澄斋日记》看恽毓鼎的一生
- 110 黄力民 麦克阿瑟是怎样被解职的

掌故钩沉

- 117 徐卫东 明初空印案及其发生的时间
- 124 闻性真 努尔哈赤与明朝的人参商战
- 128 徐思彦 思出其位:《历史研究》与苏州金德门案

九州风土

- 132 王振忠 漂广东(上)

一家之言

- 142 李鸿宾 民族性在认同中的位置——以唐朝郭子仪、阿布思、仆固怀恩为例
- 148 曹刚华 以史证文:“黔之驴”的真正杀手

旧案重审

- 156 李友松 华佗真的曾替关羽刮骨疗毒吗?



又为学界哭英灵 乔幼梅 王学典*

——痛悼赵俪生先生

2007年11月27日10时20分,一颗非凡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个杰出的大脑停止了思维,一双闪烁着智慧的眼睛不再放射光芒!

赵俪生先生走了,带着对此岸的若干留恋和深刻遗憾,到彼岸去寻找他那追索了一生的无缺陷的乐土去了。

先生走了,一个理想主义者走了,一个完美主义者走了,一个自由主义者走了,一个共产主义者走了……

先生走了,这个平庸的世界从此又少了一个“另类”,这个平庸的世界从此会宁静不少,但这个平庸的世界也从此失去了使自己超出平庸的可能!

他让人敬仰,他让人羡慕,他让人嫉妒,他也让人恐惧让人仇视:他的皎洁的人格像一面雪亮的镜子,让许多人从中照出了自己的卑污和渺小、齷齪和猥琐;这面镜子从此消失了,于是大家在没有参照中变得半斤八两,彼此彼此。

他是一个天才,他是一个有缺点的天才。鹰有时比鸡飞得还低,但鸡永远不会成为鹰,鹰也永远不会因此而不如鸡;有缺点的天才也许会永远遭受那些完美无缺的庸人们的指指戳戳、喊喊喳喳,但庸人绝不会从中获得别人对自己智力水准的尊敬。

高高者易折,皎皎者易污,天才的命运在许多时代都会成为问题。正如歌德

* 乔幼梅,山东大学教授;王学典,山东大学教授,《文史哲》主编。

在《浮士德》里所慨叹的那样：“那少数通晓事理的人，都有几分傻气，不知道明哲保身，只落得在十字架和火刑堆上丧命。”现代社会不管有多少功绩，它依然不是天才能从中感受到温暖的故乡。在“极左”的知识分子政策占据主流的岁月里，天才、特别是那些有骨气的天才知识者的命运，其所蒙受的苦难之重尤非歌德所能想象！

清华大学外语系的高才生，“一二·九”学生游行中的掌旗人，“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第二战区山西抗日前线的游击战士，第二战区政治保卫队营教导员，华北大学第四部研究员，济南市市政府秘书，中国科学院编译处副处长、中国科学院学习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陈伯达等）学习小组组长，有这些光环作后盾，假如我们的先生再圆滑一点、平庸一点、低调一点、随和一点，那他绝对会位居日后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高级领导人之列。不，那不是他的追求，那更不是他的性格。路见不平，拔剑而起，而不管会带来何种后果，这才是赵先生！于是，他与华北大学副校长成仿吾发生了冲突，紧接着，又与郭沫若发生了冲突，这两场冲突的结果是他从“中央”走向了地方，以后到过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最后落脚在兰州大学，而所到之处几乎都与顶头上司有若干摩擦，于是，一系列厄运接踵而至：调往兰州仍被押回补划为“右派”，革掉教职，劳动改造；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巅峰时期，爱女为采摘野菜掉崖夭亡，他本人则从死人堆里爬回家中，然后就是“文革”浩劫，浩劫之后，他依然有志难伸……就这样，他完整地经历了一个杰出的智者所能经历的所有苦难。

仅仅把先生所遭遇的苦难归结于性格气质本身，尽管这种看法很流行，但却是一种非常浅薄的观察。棱角分明、眼里容不得沙子的气质与体制的不兼容，才是其中最根本的因素。甚至包括先生那为人所诟病的“坏脾气”也与这种体制密不可分：先生的肉体在体制之内，先生的思想、境界和趣味却在体制之外。先生一生都在挣扎，都处在撕裂之中，这诱发、促成了他的坏脾气，他的坏脾气又加剧了他与周围人、特别是作为这种体制的物质承担者的许多顶头上司的冲突，从而导致他运交华盖、苦难迭至。

先生走了，史学界的一个独行侠走了，史学圈里的一个边缘人走了，而我们

更应当看到,中国当代学术史的一个卓越创造者走了。

先生首先为20世纪中国史学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学科,这是当代学术史家们公认的一个基本事实,这个学科就是“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而农民战争史研究被视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史学的“五朵金花”之一。在先生之前,不是没有人注意过议论过农民战争,毛泽东、范文澜等不少人就发表过许多原则性的看法;在先生同时,也有不少人在从事此一研究,但没有一个人像先生那样对整个中国农民战争史作了如此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所以,作为一个学科、一个专门领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者是先生。在夫人高昭一的协助下,先生从年表和地图做起,从陈胜、吴广起义开始,几乎逐个清理了所有起义、包括那些并不起眼的小规模起义,而且,从个别到一般,先生还特别提出并探讨了这一领域里的一些理论问题,如农民政权的性质问题、皇权主义问题、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农民战争与统一战争的关系问题等等。先生在这一方面的成果结集在《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中,这部著作在1954年的出版,堪称农民战争史学科诞生的标志。更为重要的是,先生在山东大学培养的两大弟子孙祚民和孙达人也都在史学界声名赫赫、风云一时。孙祚民先生从“右”的方面发展了先生的观点,把“皇权主义”和“让步政策”论系统化,引来了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铺天盖地的批判;孙达人先生把先生的观点往“左”的方向引申,提出“反攻倒算”说,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称赞。红花绿叶,“前有张保有后有王横”,他们共同把作为中军的先生推向“开山”和“主帅”的宝座。严格说来,1980年之前的中国农民战争研究史基本上是以他们师徒三人为中心的历史,而1980年之后,这一学科则开始走下坡路了。

如果说先生是“农民战争史”研究这朵金花的最初培育者的话,那么,先生的“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则是“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这朵金花所结出的丰硕果实。虽非“开山”,但先生在这一领域里的贡献也肯定将在当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一页。《中国土地制度史论要》则是先生这一方面研究的代表作。精义滚滚,卓见纷呈,是这部著作给人的深刻感受。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中的焦点一直是:在数千年来的历史中,国有制与私有制究竟哪一个占主导地位?先生则撇开这种非此即彼、简单绝对的思维方式,指出中国历史上既无成熟纯粹的私有制,也无成熟纯粹的国有制。在中国历史上,那种纯粹的私有财产,那种可以任

意使用、滥用乃至毁灭财产的私有权力,到鸦片战争甚至土地改革前,一直都不曾出现过;私有制有其自身的浅化阶段和深化阶段,中国的土地私有制一直都处在这种从浅化到深化的过渡时期,而古老共同体和强大的国家权力的存在则阻碍了这种从浅化到深化的过渡速度,使得中国的所有制一直带有“亚细亚”的色彩;先生上述这些经典概括早已成为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领域里的不刊之论,并为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的研究所证实,先生因此使自己成为这一领域里最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大家之一。

在土地制度史研究告一段落之后,晚年的先生又投身到与“文化热”相伴而来的“文化史”研究中去,他要从中寻找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的精神和观念动力。尽管在这一研究中,先生似乎并未尽展其才,但先生那种不知老之将至而毅然开辟新的学术天地的万丈雄心却着实令人感动,着实令后生惭愧!

由政治史(农民战争史)而经济史(土地制度史)而文化史,若假以时日,先生的研究重点有可能还会转移。正是先生兴趣的这种不断转移,使他遭受了诸多所谓“主流学者”的疏远和排斥。他们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治学没有“老营盘”和“根据地”,是“游击主义”,不值得提倡。这实在是降低了先生的智力水准!纯粹是材质平庸者之见!说穿了,这是专家对通人的蔑视!想想黑格尔和马克思吧,他们一生研究过多少领域?谁敢因他们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而蔑视他们!他们固然没有“老营盘”,但他们却是人类智慧不可企及的高峰!他们固然没有“根据地”,但不知多少所谓的专家靠他们的著作和思想来养活!分科治学固然是现代学术的特点,但那些才华横溢的不羁之才却不受此限。先生当然无法与黑格尔、马克思相提并论,但先生却绝对可以置身于以他们为代表的通人之列。但由于一段时间以来的学界是那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专家的天下,先生竟被这些所谓的专家蛮横地排斥在“博士生导师”的队伍之外,这是一次专家对通人的冷酷压制!先生不是所谓的“博导”,这绝对无损于先生的光辉和学术水准,而只能暴露出通行的所谓专家标准的霸道和残忍!

先生长期以来即被那些所谓的“主流史家”放逐到学界的边缘,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边缘人”和“独行侠”,不仅因为先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专家,还因为先生同时获罪于“主流史家”的两个最主要部分:考据派和正统唯物史观派。获

罪于前者,是因为先生公开表达了对他们的轻蔑:“我从一接触史学近著起,就憎恨琐节考据”,“让那些琐节考证的史学家们去笑骂吧,我并不是你们那里的长住客”。不仅如此,先生还挑战了他们“论从史出”和“竭泽而渔”的行规,认为“以论带史”的提法没有错,特别对那些习染于琐节考据而不能自拔的人来说,用理论带一带并没有什么坏处;对“竭泽而渔”式的材料搜集,先生明言“我不赞成”,原因第一,鱼实际上是捞不完的,第二,舍弃那些小鱼不影响对历史的概括。“光考据不行还需要思辨”,是先生坚定的治学主张。这里事实上提出了这样一个认识论问题,即“史”与“论”在治学过程中的互动问题。“史”为基础,这无可怀疑,但承认这一点丝毫也不意味着“论”就始终是次要的、被动的、消极的,永远是第二位的,——“论”也同时有可能处在更积极更主动更活跃的位置上。但不管怎么说,先生的上述言行长期以来都为考据学家们所无法容忍。撇开流行的教条和二手三手的马克思主义,独立地直接地从马克思那里寻求思想资源,先生又由此不见容于那些立身于教条的唯物史观派学人。高举“教条”很长时间以来早已成为许多人的利益所在,而先生却不仅未曾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忠诚中得到过任何回报,相反,他甚至还因此受到某些海外汉学家的奚落。天不收地不留,先生遂长期漂泊于学界主流之外,忍受着难以承受的孤独与寂寞的折磨。直至去世,先生都没有获得他在学界的应有地位。门户之见有深害于学术,于此可见一斑。

先生走了,他肯定是带着一种深深的“山大情结”走的。虽然1957年就离开了山东大学,但在此后的整整五十年中,先生可能未曾有一天忘却过山东大学,就像山大校园内未曾有一天没有人谈论、怀念先生一样。这里曾给他带来过巨大的欢乐,这里当然也给他留下了难以抹去的不愉快回忆。

应该说,华岗领导下的山东大学接纳了先生更成就了先生。先生最灿烂的文章是在这里写就,先生最奔放的热情和才华是在这里释放与施展,先生留在当代学术史上的那些最绚丽的华章是在“碧海蓝天红墙绿瓦”的青岛山大校园里编织。山东大学成就了先生,先生也厚厚地回报了山东大学,“文史见长”的盛誉里,谁知凝结着先生多少心血多少才情!

先生走了,山东大学历史系著名的“八大金刚”中最后一位金刚走了,“八马

同槽”中最后、也是最为烈性的一匹骏马走了，铸成山大史学辉煌的最后一位创造者和见证人走了。先生的走，可能也意味着当代学术史上的山大文科一个辉煌时代的真正结束！

先生走了，《文史哲》杂志的最后一位创始人走了，《文史哲》杂志最后一位早期编委走了。创刊时期的《文史哲》是一份同人杂志，先生就是当时那少数同人之一；《文史哲》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一片江山，先生为打下这片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请看先生在“自撰学术年表”中的记载：1953年发表论文四篇，全部刊载在《文史哲》上；1954年发表论文五篇，有三篇刊载在《文史哲》上；1955年发表论文四篇，全部刊载在《文史哲》上；1956年发表论文三篇，全部刊载在《文史哲》上。除了这些有形的文章之外，谁又知道先生当年还在这份杂志上倾注过多少心血！

先生走了，一个所有弟子门生后学小辈最好的老师走了，能有机会沐浴在先生的教泽之中，那是作为学生在今生今世的最大幸运！双目微阖、浓眉紧锁、面向墙角、双臂屈张有致、富有磁性和节律的男中音掷地有声，所有听众的情绪随着先生声音的高低而起伏，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课堂气氛，那是一种怎样的师生互动！在极大的精神愉悦中接受知识和启迪，在润物细无声中转移性情和提升境界，这在课堂讲授已被程式化的今天，怎能不令人想起先生。先生走了，先生长眠不醒了，但先生讲课时那种挥洒自如的卓越风姿、光芒四射的奕奕神采，将成为杏坛上的一种永远的向往！

先生走了，所有的山大人希望先生的英魂在这里永驻，这里才是先生永远的故乡！

先生走了，走得潇洒坦荡，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地，但先生所经历的时代所生存的社会所栖身的学界却均有愧于先生！识者同悲，故旧同哭，为先生哭，为历史上所有的冤屈者哭，为所有的壮志难酬者哭，为所有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天才哭，更为我们这个民族在一段时间内创造力的被戕害哭！

先生走了，告别了这个复杂的尘世，往天国去了。但据说通往天国的路也不平坦，先生您走好！

胡适留学归来时 邵建*

“如今我们回来了……”

“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这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十八章中的一句诗，胡适译为“如果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19世纪英国的“牛津运动”即“宗教改良运动”未起时，未来的宗教领袖纽曼与他的朋友们痛恨英国国教的腐败，很想大大地改革一番。他们作了一些宗教性的诗歌，在汇集成册时，纽曼从荷马史诗中摘出这一句作为诗集的题词，用以励志。胡适读后，为之动容，一边赞“其气象可想”，一边声称“此亦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见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卷2，第555~556页。1919年7月间，胡适应少年中国学会的邀请，作了一次“少年中国之精神”的讲演，讲演最后，胡适重述了当年纽曼的故事。在谈到荷马这句诗时，胡适译为：“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此时，胡适回国已经两年。）

胡适是1917年6月9日离开纽约回国的，以上这篇日记作于回国前三个月的3月8日。去国七载，归程在即，胡适何尝不想施展自己的抱负，因此，纽曼所引荷马史诗实在也是此时胡适的心声。那么，“已回来”的胡适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分晓”和“不同”呢？那就是已经载入20世纪史册的新文学运动和白话文运动。

新文学运动作为一场“文学革命”，不但改变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语言）方

* 邵建，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向,也改变了一个民族的语用方式,这样一场巨大的变革,是由胡适他们完成的。

胡适还在美国时,就萌发了文学革命的冲动。可以看到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时期的胡适做博士论文不过用了九个月(1916年8月~1917年4月),然而,自1915年秋入哥大始,胡适的兴趣和精力,显然就主要投放在他所主张的“文学革命”上。这年9月离开康奈尔大学前,胡适有送梅光迪(颢庄)去哈佛的诗,曰:“梅生梅生勿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起者/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这其实也是说给自己听的。没想到,在以后的文学革命的讨论中,反对胡适最力的恰恰就是梅光迪,当然也包括胡适的好友朱经农、任鸿隽等。也正因了这反对,胡适的意志更形坚定,1917年4月间,也就是博士论文快要完成的当儿,胡适以词明志,调寄《沁园春》,其下阕曰:“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摹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胡适就是带着这样的心志回来的。虽然一纸大话,回来后的他(当然不止他一人)还真贡献了一场文学运动,遂使白话文学成为文学主流。当年纽曼用以励志的诗,胡适真正地做到了。至少,“白话运动”之于中国,其意义远大于“牛津运动”之于英伦。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不得不说,胡适创造了历史。

然而,就这场“文学革命”而言,是典型的“墙外开花墙内香”。那篇发端性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虽然登在1917年元月出版的《新青年》上,但胡适人还没有回来,文章也是在美国写的,并且是和朋友讨论中形成的想法。本来,胡适是声张“文学革命”的,为何到了《新青年》上却变成了“文学改良”?根据胡适自述,他的白话主张,在美国受到了朋友们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革命也就蜕化为改良了。胡适的本意,文字题为“刍议”,诗集名为“尝试”,该不会引起国内很大的反感了吧。谁知,陈独秀接过这篇文章,意犹未尽,不但写了“编后语”,声称“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更在下一期《新青年》上把胡适的“文学改良论”重新翻覆为“文学革命论”。一则推举胡适为文学革命的“首举义旗之急先锋”,一则把胡适的“文学八事”更激进为“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